

變化的人間、複數的人間、競爭的人間 ——記參加《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 新書發布座談會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2024 年底，我初訪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相當偶然。走過大門廣場，穿越禮敬大廳，成佛大道引領我的視野向上開展。綠草綿延，佛光大佛座落遠方，兩側八座寶塔高聳，菩提樹夾雜其間，匯聚成雄偉壯闊的地景，崇高的美感讓人讚歎。

在藏經樓宗祖殿，星雲大師以一筆字傳達佛法義理，令人玩味。細讀壁上〈真誠的告白〉，大師說：「我一生，人家都以為我聚眾有方，事實上我的內心非常孤寂，我沒有最喜歡的人，也沒有最厭惡的人」；「傳燈會竭盡所能安排適能適任，對於個人所長、想法縱有所差，大家都要忍耐。世間難以論平等，我們要把它創造成和平、美滿的人生，但也要看在哪個角度來論平等」；「大家對山上的老樹、小花，要多多愛護，山下的村民、百姓，應該給予關懷」。¹這些話語，有自剖、也有論世；有回顧、也有前瞻；有擔憂、也有叮嚀，既讓人感受一位諄諄長者的溫暖，也一睹有血有肉的偉大宗教家的真摯情懷。大師離世前最後的告白，讓人感動，又有所領悟，不同以往的任何感受。

1. 星雲大師：〈真誠的告白〉，《佛光山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堂上第一代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行狀》，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2023 年，頁 16、17、21。

2025年5月，承妙願法師邀請，我再訪佛光山，參加《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以下簡稱《傳燈錄》）新書發布會及座談會，會中也受妙益法師照顧。星雲大師成就遍及全球的佛光山偉業，他遺留後人的395冊《星雲大師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同樣是偉業。如今由弟子組成編輯團隊，從《全集》採菁擷華，綜合論述，聚成3冊，以便人們易於掌握大師的思想言行及貢獻，這又完成另一項艱困的大業。

一、人間是變化的——關於述而不作

兩天的基調演講及論壇，在專家學者與法師發言中，有三項議題，經常出現，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是關於「述而不作」。《傳燈錄》既基於大師《全集》，編輯序「以師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的標題，明白宣示弟子謹遵師訓，無有逾越。會中學者專家對《傳燈錄》也多有「述而不作」的形容，認為屬於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所謂的「照著說」（相對於「接著說」）性質，²同時又有「弟子

2. 馮友蘭在《新理學》（1939出版）緒論中首次提到「照著講」與「接著講」的概念：「本書名為新理學。何以名為新理學？其理由有二點可說。就第一點說，照我們的看法，宋明以後底道學，有理學心學二派。我們現在所講之系統，大體上是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我們說：『大體上』，因為在許多點，我們亦有與宋明以來底理學，大不相同之處。我們說：『承接』，因為我們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因此我們自號我們的系統為新理學。」見馮友蘭：《新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1。至於馮友蘭為什麼要談「照著講」與「接著講」的問題，他在後來的《三松堂自序》（1984）中有所解釋。他提到抗日戰爭時顛沛流離，民族興亡與歷史變化激發他寫了《新理學》等六部書；而這六部實為一部書，主要在於反思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生活。但他說這些都是「外因」，而「內因」是他在完成《中國哲學史》後，興趣由研究哲學史轉移到哲學創作。他說：「哲學方面的創作總是憑借於過去的思想資料，研究哲學史和哲學創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過還是有不同。哲學史的重點是要說明以前的人對於某一哲學問題是怎樣說的；哲學創作是要說明自己對於某一哲學問題是怎麼想的。自己怎麼想，總要以前人怎麼說為思想資料，但也總要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學》中所說的“照著講”和“接著講”的不同。」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12-213。

述而不作，不創新，即為傳燈」之說；也有法師談及編輯之困難，感嘆「要研究星雲大師很難，因為師父都把話說完了」。這些固然顯示弟子弘揚大師心志時堅定又謙虛，以及學者專家對大師的尊崇禮敬，但從「敘事社會學」（sociology of narrative）的觀點來看，卻有值得思索之處。

這裡所謂的敘事，大致等於「故事」，因此敘事社會學也可理解為「說故事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y of storytelling）。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們說故事的現象，其中至少包括四個要素：誰在說（說故事者）、誰在聽（聽故事者）、說了什麼（故事文本）、脈絡（何時何地說，包括時空、說者與聽者的關係，以及更廣大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換言之，說故事並不僅僅等於故事（文本）本身，而是包括這四個要素的複雜現象。一個故事所能達成的效果或影響，是這四個要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³

時間隨時流逝，我們的身心及外在世界也不斷改變。就此而言，我們幾乎不可能完全「如實重訴」一個故事，因為就算故事文本一字不差，但原來的說者、聽者、脈絡都在變化，這使得說者對那個所謂「同樣的」故事文本，可能調整訴說方式，而聽者聆聽的感受或許也有轉變，因此故事文本對說者、聽者的意義或影響，都可能異於往日；更遑論在不同時空脈絡中，故事通常有了另外的說者及聽者，這使故事的作用更難以預料。簡單來說，說故事，即使同一則故事，是不可能完全述而不作的。

對於《傳燈錄》與《全集》的關係，述而不作、照著說、把話說完之類的形容，大致上都只聚焦於文本這一點上。如果將《全集》

3. 參見 Plummer, Ken.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 and Social World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20-24.

395 冊，比擬成星雲大師講過的 395 則故事，那麼 3 冊《傳燈錄》就是將它們精鍊轉化，重講成 3 則故事，這是需要何等創意與毅力的巨大改作！這不僅大改故事文本，且事實上如今的說者、聽者、脈絡更迥異於大師生前；換言之，借用說故事現象的四個要素來看，《傳燈錄》雖然出於《全集》，謹守大師心志，但事實上述中有作，有其獨立創新的生命。

不斷變化的聽者、說者、脈絡，豈不就是人間的根本情境？人間，就是社會學研究的「社會」，而社會生活無時不在變遷。面對無時不變的人間或社會，人間佛教，尤其是程恭讓教授特別標舉的「現代人間佛教」，⁴是不可能述而不作的。二十世紀末以來，全球各地社會的變遷更加快速。當前人間佛教要以現實即淨土，要先入世後出世，先度生後度死，先生活後生死，⁵一定是既述且作，甚至是作大於述的，否則無以應對眼下變遷加速的人間或社會。這也許是星雲大師辭世後，要承接大師心志、繼續壯大佛光山事業的弟子們，更需面對的情境及挑戰。一言以蔽之，人間佛教沒有述而不作的幸運，而是立基於佛法與師訓的興發創作，並且如慧開法師在座談會中所說的，「永遠做不完」。這大概也就是大師一向並重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之意；《傳燈錄》應該也是面對新局所行的方便，為利於傳播大師的言行思想。⁶

4. 程恭讓：〈總論——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座燈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上），高雄：佛光文化，2025 年 5 月，頁 53。

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上），頁 239；〈佛光山簡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新書發布座談會會議手冊，2025 年 5 月，頁 2。

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上），頁 220-225；程恭讓：〈總論——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座燈塔〉，頁 71-83。

二、人間是競爭的——關於開宗立派

第二，基調演講及論壇中，有幾位學者都表示支持成立「佛光宗」，這引人思考另一個議題：開宗立派。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無需諱言，這牽涉到競爭的問題。叢林佛教與滾滾紅塵競爭，而決心入世的人間佛教，不僅仍須與各種世俗執念競爭，更必須與其他的宗教或教派競爭。

有宗教社會學家指出，特別是從 1990 年代開始（所謂「晚期現代性」時期），全球各種宗教普遍深受市場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及消費主義影響，因而改變其性質與實踐方式；民族國家（政治力量）對宗教的關係密切程度及影響大小，逐漸不如市場（經濟力量），而這使宗教及其信仰市場化，並走出傳統的活動範圍而以各種面貌出現，與醫療、教育、政治、娛樂、運動、藝術等社會領域結合。⁷ 走入人間的佛教，無法迴避社會競爭以及與各領域結合的趨勢。開宗立派，有利於突出宗派的獨特身分，強化弟子信眾的認同，凝聚四方善緣助力。

7. Gauthier, François. *Religion, Modernity, Globalisation: Nation-state to Mark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7-10. 參見：Gauthier, François, et al., eds., "Religion in Consumer Society," special issue, *Social Compass*, Vol. 58, No.3 (2011); Gauthier, François and Tuomas Martikainen, eds., *Religion in Consumer Society: Brands, Consumers and Marke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Martikainen, Tuomas and François Gauthier, eds., *Religion in the Neoliberal Age: Modes of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3); Usunier, Jean-Claude and Jörg Stolz, eds. *Religions as Bran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Marketization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Stolz, Joerg and Jean-Claude Usunier. "Religions as Brands?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Consumer Socie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pirituality & Religion*, Vol. 16, No.1 (2019), pp. 6-31; Sorgenfrei, Simon. "Branding Salafism: Salafi Missionaries a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Method &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Vol. 34, No.3 (2021), pp. 211-237.

佛光山雖尚未明立「佛光宗」之名，早有宗派之實，與證嚴法師創立的慈濟功德會、聖嚴法師開創的法鼓山，早已並立為台灣人間佛教三大教團。另外，星雲大師一篇〈真誠的告白〉，所談盡是人間困難的選擇、世人經常擺盪其間的二元相對：空有、內外、人我、男女、公私、貧富、難易、好壞、喜惡、生死，以及施或受、出世或入世、平等或高低、圓滿或缺憾，乃至於佛法或世法。在這些二元相對中，大師固然多有堅定的依歸，但也有無可無不可的通達，未必執著於兩端。大師說「世間的人事各有所執」，古來印度就有上座部、大眾部，中國則有八大宗派，「在教義上實踐理念各有不同，無可厚非」；又說「為團結佛光僧信四眾，可以效法過去古德聖賢成立一個宗派」，「有個當代佛教的宗派來為佛教撐持，做擎天一柱，這也未嘗不可」。⁸

換句話說，隨緣發展，或開宗立派，同樣都無可無不可，一以有利於人間佛教發展為依歸。大師說：「我們的理念不在於自我的成就，是在於佛法能夠傳承」，即使明立宗派，也不能「在人我是非上較量」。⁹如此看來，不立宗派，但求隨緣，大概是看山不是山，這是一個境界；但立宗派而不拘於宗派，自在又容人，既為團結人間，也為增進佛法，都是方便而已，看山仍是山，這又是另一境界。

三、人間是複數的——關於人間佛教的人間條件

第三，前兩個議題，是兩天的講論明白觸及的，至於另一個我感到在其中隱而不顯的議題，則是：人間是單數的，還是複數的？

8. 星雲大師：〈真誠的告白〉，《佛光山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堂上第一代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行狀》，頁20、21。

9. 同註8，頁21。

這仍然要從「敘事社會學」的角度談起。

沒有故事的世界，難以想像。人本身就是講故事的動物，既喜歡說，也喜歡聽故事。從遠古以來，人們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在傳遞故事。¹⁰ 如果說將《全集》395 冊化做 3 冊《傳燈錄》，就像將大師講過的 395 則故事，重訴成 3 則故事，那麼新書發布座談會整體而言，也就像聚集眾人，大家藉此再講、再聽、再分享一次大師故事的場合。大師的故事，就像眾多英雄或偉人的故事一樣，每次的講述或聆聽，都是對他們感人的事蹟，再一次的溫習、理解與禮敬。人類的社會，或者說人間，經常是憑藉故事的傳遞，既述且作，而達到文化的新舊交融與世代傳承，得以生生不息。

新書發布座談會中，學者專家或各有側重，或詳簡不一，但整體無非在講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故事。歸納來看，大致又有主從兩個故事軸線。主要軸線直接明白，是關於大師如何改革轉化傳統叢林佛教、發展人間佛教、開創佛光山事業，因而貢獻於佛教、振興佛教；次要軸線則間接傳達，是有關大師推動人間佛教，如何裨益大眾，提升文化，貢獻於社會。

大師在〈真誠的告白〉中說：「我一生，服膺於『給』的哲學，總是給人讚歎、給人滿願；我立下佛光人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從「給」的角度來看，新書發布座談會眾人所說的大師故事的上述兩條軸線，主要軸線可以說在談大師給了佛教什麼，次要軸線在說大師因為推動人間佛教而給了人間什麼。

10. 參見蕭阿勤：〈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重探龍冠海與「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收入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 年，頁 162-165。

程恭讓教授總論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曾指出：

在現代人間佛教開展的一百多年中，星雲大師確實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宛若一座璀璨奪目的燈塔，在漫漫的黑夜中，照亮黝暗的大海，引導千萬信眾，也啟示現當代佛教繼續前行的道路。……關於星雲大師弘揚佛教的功德，特別是關於星雲大師在現代人間佛教及全球現代佛教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們也的確可以如斯說：天不生星雲，萬古長如夜！¹¹

程教授更以五個「如果沒有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弘揚與落實」的反事實假設，進一步闡述大師的成就。程教授所說的大師的故事，大致也不離上述兩條軸線。

我的老師 Richard Madsen（趙文詞）教授的《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一書，探討台灣解除戒嚴後，1980年代開始的宗教復興運動中，慈濟、佛光山、法鼓山與行天宮，這四個具代表性的佛、道教團體與民主政治的關係。¹²他指出這四個團體的教義與實踐，有異也有同。他們的居士組織龐大，金融資產豐厚，媒體運用能力極佳；他們革新傳統教義與實踐方式，以配合台灣的現代化進程。這四個團體都認為個人毋須逃離家庭，就能實踐救世或眾生平等的理想。他們提供心靈指導，提倡個人的自由、平等與提升，也鼓勵人們參與公共事務，同時並重個人的自主意識與集體的責任感。這些都促進了台灣民主所需的公民意識，也有助於廣泛

11. 程恭讓：〈總論——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座燈塔〉，頁 55。

12. 趙文詞（Richard Madsen）：《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

的社會凝聚。因此這四個團體對於台灣民主的穩固和本土意識發展，都有重要的正面貢獻。¹³ 在這個論點下，趙教授所說的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故事，也偏向上述兩條軸線。

然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任何宗教的發展，都有賴特殊的社會基礎或條件（例如趙文詞教授書中論及四個宗教團體的成長，奠基於台灣新興中產階級的財富及力量的支持，以及其心靈的需要¹⁴）。如果社會就是人間，大師推動人間佛教，因此「給」了人間什麼，那麼從反方向來看，人間是否也「給」了大師的人間佛教什麼呢？是什麼社會基礎或條件，使大師領導的人間佛教可以蓬勃發展、成就偉業呢？這就牽涉到人間到底是單數或複數的問題。

沿著上述主從兩條軸線所說的故事，其中的「人間」，似乎都是單數的：只有同質的一個人間，它籠統模糊地泛指這個世界的人類社會。但是大師的人間佛教事業，又處處在提示我們：人間是複數的，世界各國各地的社會都是具體而異質的，不可一概而論。

1938年，大師十二歲時於棲霞山出家，1941年萌發要「走出去」及「新佛教運動」的想法，1945年十八歲進焦山佛學院就讀，則堅定其「人間化教育」及復興佛教的心志。¹⁵ 對日抗戰勝利後「江蘇和京滬佛教自有其燦爛輝煌的一頁」，開始「從自利的佛教走上利人的佛教」，「從保守的佛教已經走上進取的佛教」，¹⁶ 但大師

13. 蕭阿勤：〈導讀：宗教、民主政治與現代性危機〉，收入趙文詞（Richard Madsen）：《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頁4-5。

14. 同註12，頁62-65。

1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上），頁20-21；《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下），頁36-37。

16. 星雲大師：〈回憶比現實美麗——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星雲大師全集231·雲水樓拾語1》（增訂版），頁169。

有真正的實驗場可以實踐理念而真正推動人間佛教，是在 1949 年 22 歲來到台灣之後。

大師初抵台灣，觀察到當時本地佛教輕視戒律、忽視教育、負面的日本化影響、與齋教及民間信仰混合、不同省籍與地域的僧人不易來往融合等問題。1954 年大師發表〈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一文，既歸納日本殖民統治後當時台灣佛教的弊病，也詳述戰後幾年內台灣佛教的振興與快速進步。¹⁷ 大師在文中談到：「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實行民主政治，信教自由。為配合政治，改善民風，對於神化迷信的拜拜習俗，政府首先改革」；「自從台灣被尊為自由中國復興的基地，社會文化的宣傳，不消說一日千里，佛教也受了社會文化的影響，一改以往緘默的態度而趨向宣傳了」；又說「民主時代，不論政治、宗教、文化、教育，都不能脫離社會廣大群眾，特別是建設在人民信仰上的佛教，更不能離開社會，所以台灣佛教日漸於社會化了」。在文章最後，大師則談到：「總結的說：台灣的佛教六年來的進步，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超過日本五十年統治時代的進步」；但他強調，「將來進步到怎樣的程度，還要看未來的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的趨勢」。簡言之，從他抵台後對台灣佛教的初期觀察階段（1948-1954）開始，大師就明白佛教能否振興，人間佛教能否進展，既繫於佛門弟子本身的努力，但所處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等條件也是關鍵，其中民主自由是要件之一。

〈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發表之後，大師邁入另一個階段（1955-1964）：「開啟對台灣佛教的積極應對與變革探索」；「以宜蘭念佛會、高雄壽山寺作為佛教改革的基地，逐步將其人間佛教

17.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下），頁 19、28-30。

藍圖付諸實踐」。¹⁸ 1967年，大師終於在高雄開創佛光山。他將理念落實為各種行動、制度及組織，這些實踐所回應或對治的，無非是戰後台灣佛教的具體情境或困境。我們可以說，大師推展人間佛教的過程，就是回應 1949 年後台灣的社會現實、對治台灣佛教困境的過程，而其所成就的佛光山人間佛教偉業，就是回應對治的成果。

星雲大師締造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偉業，相對地，台灣社會——這個獨特的人間，因為其特殊的政經文化等條件，也成就了星雲大師及其偉業。

人間佛教在理念上討論的人間，是共相，是此世的人類社會；而人間佛教在實踐上面對的人間，是殊相，是各國各地性質相異的具體社會。人間佛教成就偉業，一方面顯示入世的佛教可以裨益人間，另一方面也反映有人間、才有佛教，有人間、始成人間佛教；而實際的人間，是複數而異質的。人間佛教「給」了人間美善及希望，減少苦難；但 1949 年後獨特的台灣社會的人間，也「給」了人間佛教發展的有利的社會基礎及條件。

大師自許為「地球人」，處處皆可為家。他基於這個理念，推動人間佛教全球化。但為了將佛法帶到全球，又需要「適應不同的文化背景，並逐漸朝『本土化』邁進，才能讓佛教在各地生根成長」。¹⁹ 在〈真誠的告白〉中，他叮囑「世界各地的道場，要儘量給予本土化，請當地徒眾住持」。²⁰ 這無疑在說：全球化與本土化

1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下），頁 35-36。

1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中），頁 520-525。

20. 星雲大師：〈真誠的告白〉，《佛光山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堂上第一代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行狀》，頁 19。

看似矛盾，但全球化的基礎，在於本土化；只有透過本土化，才能達到全球化。正因為具體的人間是複數而異質的，才需要針對當地的本土化。回顧來看，人間佛教能夠在國際上開枝散葉，正是因為它在台灣本土扎根深穩，而台灣這個獨特的人間，始終供給它珍貴的養分。

結語——暗室點燈點不盡，人間佛教做不完

《傳燈錄》新書發布座談會中浮現的三項議題，都刺激我們思考「人間」是什麼。在時間上，人間是變化的，所以人間佛教不可能述而不作；在空間上，人間是複數的，所以人間佛教需要本土化；在性質上，人間是競爭的，所以人間佛教開宗立派，也是無可無不可的善巧方便。

大師已圓寂，人間依舊在，而人間依然是變化的，複數的、競爭的。一旦走出叢林，走入人間現實，無疑就挑上人間的重擔。當人間更加多變，更加複雜，競奪更多，未來人間給予佛教及後繼弟子的挑戰及任務，也許只有更多。創業固維艱，守成亦不易，開拓更困難。六祖惠能大師說「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但他同時也說「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²¹換言之，一闇能滅千年燈，一愚能壓萬年智，這同樣是人間常見的現實，必須時時警惕。

在大師離去不遠的此時，世界更加動盪，世人苦難益增。瞻望人間前路，令人憂思不已。但這正顯示人間佛教在現在與未來更加可貴，而願意承擔人間佛教的佛光山，更令人景仰。

21. 《六祖壇經》〈懺悔品第六〉。